

闫超 YAN Chao

从自我技术到日常实践
漫步行为的建筑理论话语解析

From Technology of the Self to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s of Wandering Behavior in Architecture

摘要 漫步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对于研究当今高密度建成环境中的步行体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漫步作为一种自我技术，在 20 世纪批判理论话语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以漫步的空间体验规律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批判理论中围绕大都市漫步而展开的论述进行梳理和解析，揭示出漫步行为的复杂内核，包括漫步行为的体验本质、空间场所激发漫步行为的内驱力，以及漫步行为对城市空间的时空重构机制。文章还提出了对当代漫步行为研究进行拓展的潜在方向。

关键词 漫步；具身性；批判理论；行为研究

ABSTRACT Wandering, as a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is important to the study of walking experience in today's high-density built environments. Meanwhile, wandering as a self-relied technology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tical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experience of wandering by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discourses about wandering in metropolises in critical theories. It reveals the complex nature of wandering behavior, including the experiential mechanism,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wandering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spatio-temporal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by wandering behavior. The article finally proposes potential directions that research on wandering behavior can go 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discourse.

KEY WORDS Wandering; Embodiment; Critical Theory; Behavioral Study

中图分类号：TU-984.11⁺3; TU-0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717/j.cnki.ta.2023.06.024

文章编号：1005-684X(2023)06-0024-06

引文格式：闫超. 从自我技术到日常实践：漫步行为的建筑理论话语解析 [J]. 时代建筑，2023 (6)：24-29.

1 漫步：从自我技术到日常实践

漫步作为建筑学所关注的一类特殊的步行行为，既是建成环境研究的重要考察对象，也是自现代建筑以来建筑设计研究的经典议题。^[1-2]漫步的特殊性在于，漫步者既没有具体的目的地作为终点，也不寻求某种稳定的场所环境。因此，漫步者是研究身体与环境之间（不受意图影响的）纯粹适应性的最佳载体。漫步者会在物理和社会维度上不间断地改变与周围语境的关系，^[3]可以被视为一部适应性的机器，不断改变着自身的运转规律，与周围的动态环境相互协调。

建筑学者对于漫步的关注与现代性萌芽以及现代大都市（Metropolis）的出现密不可分。其背后原因可以归于三方面。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看，对步行个体进行观察本就是研究现代社会心理状态的途径，其方法论源于现代启蒙时期涌现并狂热化的容貌学（physiognomy）研

究。作为一种现代自然科学认知方式的衍生物，容貌学在约翰·克里斯蒂安·拉瓦特尔（Johann Christian Lavater）推动下，成为了一种对人体细节进行分析和分类的手段（图 1）。^[4]受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ebastian Mercier）的影响，这种方法也被应用于城市社会文化的考查，通过观察城市剧场中每个步行个体的身体行为细节，揭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心理状态（图 2）。^[5]第二，随着现代性的启蒙，时间从一种外在的抽象概念转变为内嵌在空间感知变化中的固有属性，人们对于空间感知的认识也从静态的视点转变为动态影像，并反映在绘画、摄影、建筑等多种艺术形式中（图 3），^[6]漫步成为了探讨空间感知的基本场景。第三，现代社会的工业理性主义和消费文化构成了大都市的生活境况，并成为 20 世纪批判理论所关注的对象。以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人为代表的理论工作，





1. 《容貌学文献》插图，1792 年
2. 巴黎街头的狂欢节，1778 年
3. 德拉奇赛车，雅克·亨利·拉蒂格，1912 年
4. 泽布吕赫海港码头，大都会建筑事务所 OMA，1988 年

1. Illustrations from the *Essays on Physiognomy*, 1792
2. Carnival on the streets of Paris, 1778
3. Automobile Delage, Jacques-henri-lartigue, 1912
4. Zeebrugge Sea Terminal by OMA, 1988

构成了一条对建筑学影响深远的城市研究脉络。其中，漫步者既是城市精神生活考察的重要载体，也是抵抗城市空间规训的重要日常实践。^[7-8]在这三条脉络的交织下，并随着批判理论向建筑学的引入，漫步成为了 20 世纪众多建筑学空间研究的焦点。

由于漫步行为决定着人在空间中的体验变化，因此个体在日常漫步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随意调整身体机器的运转规律（习惯），实现对于任何一个空间的顺从和适应，或摆脱任何一个空间的控制和影响。在这个视角下，漫步可以理解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绘的“自我技术”（technology of the self）。这种技术平行于我们通常所认知的生产技术（technologies of production）、信息技术（technologies of sign systems）、管理 / 权力技术（technologies of power）。通过驾驭自我技术，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独立实践或者在他者的协助下，以其身体或思维作为技术载体，进行一定效应的调试，从而达成某种程度的生存目标。^[9]因此，作为一种自我技术，漫步成为了 20 世纪个体在现代栖居空间中解决个人危机的途径。漫步者对身体这部机器进行的任意操控，依仗于一种无意识的、漠视的体验状态，及其与环境之间松散的关联性。这种漫步状态在当代高密度城市中，在高速生活节奏中，以及在每时每刻都关注手机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已然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现象。

然而，由于每一个个体都在无时无刻地通过漫步“编排”着城市空间中的个人体验，进而完成对于空间的个体化“书写”，所以同一个空间场所在体验层面会呈现出高度差异化和动态性，这也给建筑师或城市研究者带来空间认知中的高度不确定性。因此，梳理漫步这种自我技术的内核，解析空间场所与漫步行为的交互关系，并揭示物质化的空间场所如何被个体的漫步行为所重构，对于拓展当代高密度城市步行空间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2 何为漫步——无意识的步行

“漫步”一词，对应法语中的“flâneur”，源于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作品。作为一种自我技术，漫步与 20 世纪批判理论的历史语境——工业理性和消费文化的涌现和盛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以本雅明为代表的众多相关学者的眼中，漫步被作为一种理想的日常生活实践，是个体从现代大都市中抽离、抵抗现代社会规训的手段。20 世纪初期，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中，描绘了在巴黎拱廊中的漫步体验。漫步者不同于游客和消费者，他以一种抽离而

审视的状态经历着城市空间，进而得以从现代社会中逃离。^[8]而漫步作为一种超越工业理性、抽离于消费文化的空间体验方式，一直延续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的理论话语。

从漫步的内核看，其之所以可以成为个体抵抗外部环境的手段，是因为漫步者与其他步行者相比，处于一种被众多学者描述为“视觉无意识”（optical unconscious）的状态，进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更加松散。从空间感知的角度看，这种精神状态又与漫步者所经历的动态视觉体验紧密关联。本雅明曾将漫步者对周围环境的视觉感知类比为观看电影时的体验，其视觉焦点会被转瞬即逝的图像所消融。^[10]20 世纪后半叶，米歇尔·德·赛托（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中，也探讨了漫步体验与观影感知这两种视觉无意识之间的相通性。德·赛托认为，在漫步过程中，身体与空间的交互作用主要通过无意识的信息传递来构建，个体不会注意到周围空间中各层面的语义符号所构建的“文本”，而是仅仅跟随着这些文本的“浓淡”变化进行节奏性的回应。^[11]这种视觉无意识的状态也成为了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等学者在解析现代城市空间文化时的普遍理论基础。^[12]

漫步者的视觉无意识状态还与步行的速度体验有关，这一关联性可以在众多学者关于现代社会和现代技术加速属性的批判性研究中得到佐证。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曾阐述，现代社会的速度体验会让个体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在经过的具体场景上，周围环境中具有高度识别性的图形会被转瞬即逝的肌理所取代。^[13]同时，这种速度体验还可以超越漫步行为，拓展到由现代技术所催生的更多样的空间经验中。保罗·维利奥（Paul Virilio）曾提出“失神”（picnolepsy）的概念，描述现代技术的加速现象，^[14]在根本上将空间感知的认识从基于位移的空间维度转变为基于速度的时间维度。建筑理论学者阿里·格拉夫兰（Arie Graafland）挪用这一概念，以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泽布吕赫海港码头（Zeebrugge Sea Terminal，图 4）概念项目为例，阐述了汽车速度给建筑空间体验带来的失神（无意识）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如何消解空间信息的理性指涉，进而超越了后现代建筑以可识别的形状和语义所建构的人境关系。^[15]上述理论话语关于速度体验的评判立场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由相对速度所决定的视觉经验，构成了漫步者得以从周围环境中抽离的基础。

无论是本雅明还是受其影响的后续学者，“身体”始终是用于辨析心理状态的核心载体。^[16]漫步者基于视觉感知的特殊经验所形成的无意

识状态，最终会作用于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也会反映在漫步时身体与空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中。由于漫步者在空间中并没有具体的目标和目的，因此当他处于一种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时，空间与身体会逐渐进入相互渗透的沉浸关系。这时，身体会被空间形态及其表层语义之外的潜在特征所牵引着游移。20 世纪 60 年代，在围绕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运动而展开的城市批判中，这种反映在身体上的无意识状态是话语讨论的核心。作为情境主义国际的代表人物，居伊·德波（Guy Debord）将漫步者的无意识的身体运动状态描绘为在城市空间中漂流（drifting）——一种革命性的城市体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对抗空间规训的游戏技术，从而打破城市空间对个体行为的规制。^[17-18] 所谓漂流，即身体不再受具体的目标所吸引，转而对空间的潜在特征作出直觉反应。因此，在德波看来，城市也不应该被理解为基于客观物质条件的中性空间，而是由其中每一个个体的主观体验及其情感状态所聚集形成的一系列鲜明的氛围区域，而漫步者的身体会被这些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ic）层面的潜在特征区域所牵引（图 5）。情境主义者们正是通过身体介入城市空间来创造情境，并将情境作为一种潜在的空间特征，反过来驱动着身体的漂流。^[19] 在当代理论话语中，安托万·皮孔（Antoine Picon）进一步将这种驱动着身体漂流的空间解释为“领域城市（territory city）”。漫步者在空间中漂流和电子游戏的逻辑一样，是基于无意识的不断试错（trial and error）而前进，而非依仗任何空间结构上的映射（mapping）和引导。^[20] 通过这种漫无目的的身体运动，不仅消解了空间要素在视觉和语义层面的作用，同时具备消融抽象空间的结构秩序的潜力。^[21] 最终，物理空间与漫步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超越了环境尺度、场所布局、空间结构等经典的形态层面的概念，转而由一系列潜在的、瞬时身体感知所构成。

3 何以漫步——无秩序的空间

从漫步行为的形成机制看，它既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技术，同时又是在特定历史语境和栖居环境下的被动的日常现象。后者可以从另一条围绕“漠视”（blasé）概念的批判理论话语体系中进行解读。通过解析漫步者在特定环境中被迫形成的漠视状态，我们可以从外部空间的视角认识漫步的生发条件，进而理解空间如何作用于漫步者的身心。

在以齐美尔、本雅明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Frankfurt School of critical theory）中，漠视是个体抵抗现代城市过剩信息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中，分析了城市空间的熵增与个体漠视状态之间的关系。相较于小城镇连续的空间格局和统一的建筑形式，现代大都市城市肌理的断裂和建筑形式的多样化，造成个体体验层面所接收的视觉信息过剩，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层面的“震惊”（shocking）。此外，现代交通的加速属性，会在身体快速位移的过程中放大这些信息的多样性及随之而来的冲击。因此，为了构建一个相对稳定的栖居条件，个体会自然地形成一个保护性的感知过滤器，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漠视来泛化外部信息刺激。^[7] 在本雅明看来，这种漠视亦是一种由大都市的空间特征所引起的漫步者的无意识状态，最终在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形成“有益”的疏离。^[22-23]

漠视的前提是不断变换的空间所构成的视觉信息冲击，其根源在于空间的差异化——既是产生场景变化的基础，也是生产过剩信息的土壤。^[24] 另外，除了差异性本身，漫游者的漠视状态还进一步源于大都市空间所具有的迷宫属性——即个体在缺少外部参照系的前提下，无法对高度差异化的空间全局进行掌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库哈斯对现代大都市的迷宫特征进行了精辟的解析。这种城市空间不具备任何结构性的参照系，因此也无法从全局进行把握，个体漫游其中仿佛穿梭于群岛之间，所有的感官都在不断接受着大量的陌生信息冲击。^[25] 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也借用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金字塔与迷宫的概念来阐述这种缺乏外部参照系的空间体验。金字塔与迷宫分别指向从“顶部”视角对空间整体结构的认知把握，和从具身维度对空间的片段化感知。^[26] 这两种空间认知的视角会嵌套成一个相互反馈的循环。在“金字塔”的顶部视角中，个体通过想象将身体投射到空间中，以构建对身体与空间关系的理解。在“迷宫”的具身体验中，个体又会通过拼合线索，构建一种想象的顶部视角，来寻求对整个环境的结构性全面认知。而随着外部参照的瓦解，“金字塔”与“迷宫”这两种视角之间的相互参照也便被打乱。^[27] 屈米在法国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竞赛中的方案便可解读为，通过叠加差异化的空间参照系，来消解全局空间结构和具身体验视角之间的关联性（图 6）。身体在迷宫的片段中迷失对整体空间的认知，而期待“看到整体”的冲动又驱动着身体不断游移、发掘更多的空间线索，进而身体又被不断带到新的迷宫中，并接受着陌生环境信息的刺激。最终，正如德·赛托所描述的，漫步成为了一种不断缺失稳定的环境认知，又不断寻求对空间整体性把握的无限循环的过程。^[11] 伴随着陌生信息的



5. 裸城，1957年

6. 拉维莱特公园竞赛方案，伯纳德·屈米，1982年

7. 公元4世纪左右的罗马戴克里先浴场

8. 勒弗雷斯诺艺术中心，伯纳德·屈米，1992年

5. The Naked City by Guy Debord, 1957

6. Parc de la Villette by Bernard Tschumi, 1982

7. Baths of Diocletian, Roma

8. Le Fresnoy Art Center by Bernard Tschumi, 1992

不断冲击所带来的震惊，漫游者逐渐以漠视的状态从周围环境中抽离出来，回归到用瞬时的身体反应与周围空间进行对话的状态。

当然，所谓迷宫属性，并不是一种形态上的类比。在20世纪后半叶的理论话语中，这种缺失外部参照系的空间特征，可以来自功能、体验等多个方面的考量。无论是列斐伏尔对戴克里先浴场（Baths of Diocletian）的“跨功能”（transfunctional）属性的分析（图7），^[28]还是屈米提出的“交叉规划”（crossprogramming）^[29]概念，均在提出一种抵抗外部功能参照系的范本，通过抑制全局功能在个体认知中的语义再现，将空间体验回归于瞬时性的、自发的身体经验。而库哈斯在“泛化城市”（Generic City）以及“垃圾空间”（Junkspace）等论著中，描述了一种同质化的、同时又缺失外部参照系的不确定性空间。其中，同质化并不是源于标准化的工业体系及其千篇一律的空间形态，而是城市为了建立理性化的组织架构而无处不在的透明性特征，以及其建构的“一切可见”的全景场域。高度差异化的空间在全景场域中会造成视觉焦点的缺失和感知层面的急剧熵增，^[30]到处都是均质化的、同等刺激的体验。^[31]这种过度繁复的空间体验反映了现代大都市的本质，并最终导致其缺失全局参照系的混乱和无序。库哈斯所批判的因缺乏参照系而造成的空间不确定性，在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眼中成为了延续批判理论阵地的切入点。在内格里看来，这种同质化的空间同样提供了一种摆脱由物理边界构筑的社会控制的可能性。其中，无论是空间本身的不确定性，还是其中漫步者在视觉熵增下的漠视状态，都削弱了空间中自上而下所建构的外部规则，将其转化成一种开放的关联媒介，最终空间随着身体的漫步移动而不断地从内部被重构。^[32]

4 以漫步“书写”空间

无意识的漠视状态和无秩序的繁复空间，从内外两面共同促成了漫步实践。而漫步作为一种自我技术，又可以通过自身行为的编排在体验的维度重构空间。我们可以回到漫步实践对时间维度的引入，对这种空间重构进行解读。漫步体验的时间维度，与从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到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关于现象学的时间性论述息息相关。本雅明基于现代社会历史语境对漫步的讨论可以视为一种现象学研究，^[33]特别是本雅明对于现代都市体验和电影的研究均体现了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中的时间性的回应。^[34]如前文所述，在本雅明看来，漫步所产生的感知节奏与电影的感知节奏是相通的，即将空间三维

结构转译为时间维度上的二维序列。^[35]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屈米在勒弗雷斯诺艺术中心（Le Fresnoy Art Center）（图8）项目中探讨的空间问题。而时间维度上的二维序列如何能够在感知层面被有意义地重构成三维空间，便要到梅洛-庞蒂的具身知觉理论中获得解释。例如梅洛-庞蒂的经典例子，当我们在公寓周围走来走去，视知觉所接收到的无非是一系列差异的独立视图，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身体行走，以及身体动作、位移和这些视图之间的时间关联性时，它们才可能在时间维度被串联成表现同一所公寓的、不同角度的一系列视图。^[36]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研究影响了20世纪60至70年代，包括列斐伏尔在内的众多城市研究学者。后者认为在城市空间中，漫步体验必然涉及线性的时间维度，进而也涉及时间维度上的空间重构^[37]，因此，虽然城市空间在表面上是具有明显三维空间结构的系统，然而在每一个漫步者的感知中，城市实则由其中一条时间线上的空间视图序列所组成。而序列本身又取决于漫步者在空间中的行走路径的选择，因此，城市在漫步者的体验维度会呈现出巨大的动态变化。另外，涉及时间维度的城市体验的重点不在于每个场景的静态视图本身，而在于每两个场景之间的切换过程。因此，除了由行走路径决定的空间顺序之外，至关重要是行走体验的空间序列中每两个并置场景之间的差异性，及其产生的节奏。德·塞托将漫步在差异化空间中的转弯和迂回类比为语言中的修辞。随着身体在空间中行进，空间中突显的差异化形态特征如同单词词组一样，以动态变换的组合方式呈现，引导着漫步的路径选择，产生“行走的修辞”（rhetoric of walking）。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城市中蕴藏着更具吸引力的、差异化的特征，才能为行走的修辞提供词汇基础。^[11]当行走中的身体不断地适应空间，同时也不断地调整着占用空间的战术^[38]，“行走的修辞”反过来会改变感知维度的空间形态。当然，以德·塞托为代表的学者一方面受到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影响，探求空间感知的本质，但他们所关心的并非仅仅是路径选择和场景序列之间的静态对应关系。如前文所述，他们也试图研究漫步者超越理性的空间感知规律，尽管这可能违背了现象学研究的初衷。^[39]

另外，漫步者对于空间的重构还体现在集体漫步的作用。德·塞托从社会组织的角度讨论了集体如何在漫步实践中重塑空间。由于漫步即书写，除了漫步者个体与空间之间的相互修饰，漫步者之间也会通过行为表达而相互影响。如同口语交流，漫步者首先必须适应具体空间中的地形系统；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会用

漫步行为来表达对空间的占用；最后，他们会用行走动作与其他漫步者进行交流。在这种交互网络中，每个漫步者都有自己独特的修辞表达方式，每个漫步者的表达又会影响其他漫步者的行为，最终他们交织在一起的移动轨迹会在空间本身的形状内产生另一个形状。^[11]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这种现象解释为个体习性对于集体习性的本能反应。^[40] 而德波所描述的城市空间中的氛围区域，也是由漫步者的集体在场所构成的。从空间心理地理学的角度看，由于这些氛围区域会对漫步产生吸引力或排斥力，因此对于个体来说，漫步者的集体在场实则从另一个层面重构了城市本身。其中，每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身体成为了空间重构的基础。^[41]

5 结语

在 20 世纪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中，现代大都市的起源促成了学者对于漫步这种自我技术的关注，其中涉及建筑学、城市研究，以及现象学哲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领域。而漫步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又与当代高密度城市中的普遍步行体验极其相似，因此对当代步行空间的行为和感知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漫步者的身体作为一部动态机器，与周围环境之间有着复杂的协调机理。通过梳理 20 世纪关于漫步的理论话语，我们可以解析出其中三个层次的复杂性。首先，在关于漫步者无意识状态的讨论中，漫步的动态属性会消解空间的图形识别和语义内涵，空间对于个体的影响会经由复杂的瞬时身体经验而发挥作用。其次，在围绕漠视而展开的讨论中，漫步者会不断通过移动来寻求全局空间认知，但是在移动的同时又会抵抗全局的过剩信息，进而空间与个体之间往往夹着一层具有动态阈值的过滤层。最后，在关于漫步者“书写”空间的理论中，漫步会将空间结构转化为时间序列，并通过身体的行动实践，不断在物质和社会两个层面重构被体验的空间。因此，理解当代大都市（高密度城市）的漫步体验的前提是理解漫步行为本身的复杂内核。对 20 世纪批判理论中的漫步进行详细解析，可以进一步为我们挖掘漫步的特征提供切入点。同时，针对当代建成环境和建筑设计研究，一方面，常规设计认知中的空间结构和功能规划等体系在漫步中已不再具有架构行为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探索新的体系来描述空间对行为的干预；另一方面，空间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静态的、可还原的映射，而往往会生出超越理性的行为现象，因此，如何解析这些现象也成为了关注身体和行为的建筑学所需要继续挖掘的议题。

（图片来源：图1来自Johann Christian Lavater. Essays On Physiognomy: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Knowledge and the Love of Mankind[M]. Arkose Press, 2015；图2来自https://francearchives.gouv.fr/pages_histoire/39709；图3来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acques-henri-lartigue_1912_Automobil_Delage_na_Grand_Prix_ACF_1912b.jpg；图4来自<https://www.oma.com/projects/zebrugge-sea-terminal>；图5来自法国“区域当代艺术基金中心”（FRAC）<http://www.frac-centre.fr>；图6来自<https://www.tschumi.com/projects/3>；图7来自<http://rome-honours-groningen.co.nf/2016/Sjoukje2.php#source2>；图8来自<https://www.moma.org/collection/works/476>）

参考文献：

[1] 董豫赣. 建筑漫步 [J]. 建筑师, 2007 (05) : 5-11.
[2] 沈昕, 魏春雨. 建筑“漫步空间”的当代表达——从勒·柯布西耶到雷姆·库哈斯, 再到 SANAA[J]. 建筑师, 2012 (3) : 28-34.
[3] PARK R E., BURGESS E W.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4] SHORTLAND M. The Power of a Thousand Eyes: Johann Caspar Lavater's Science of Physiognomical Perception[J]. Criticism, Vol.28(4), 1986: 379-408.
[5] POPKIN J D. Panorama of Paris: Selections from "Tableau de Paris"[M].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KWINTER S. Architecture of Time: Toward a Theory of the Event in Modernist Cultur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1.
[7] SIMMEL G.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M]//SENNETT Richard. 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 Prentice-Hall, 1969: 47.
[8] BENJAMIN W. The Arcades Project[M]. Belknap Press, 2002.
[9] MARTIN L H, Huck Gutman, Patrick H. Hutton.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10] BENJAMIN W.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tion[M]//ARENDR Hannah.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17-252.
[11] DE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2] VIDLER A. Warped Space: Art, Architecture, and Anxiety in Modern Cultur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13] SENNETT R. 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1996.
[14] VIRILIO P. A Landscapes of Events[M]. translated by ROSE Juli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15] GRAAFLAND A. Architectural Bodies[M]. Rotterdam: 010 Publishers, 1996.
[16] WEIGEL S. Body- and Image- Space: Re-reading Walter Benjamin[M]. translated by PAUL Georgina, MCNICHOLL Rachel, and GAINES Jere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7] SADLER S. The Situationist City[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8.
[18] DEBORD G. Theory of the Derive[J].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1958, Vol.2.
[19] PILE S. Real Citie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20] PICON A. La ville territoire des cyborgs[M]. Besançon: Les Editions de l'Imprimeur, 1998.
[21] LEES L. The Emancipatory City? Paradoxes and Possibilitie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22] KEITH M. Walter Benjamin, Urban Studies, and the

Narratives of City? Life[M]//BRIDGE Gary, WATSON Sophie. A Companion to the Cit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0: 410-429.
[23] BENJAMIN W.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M]. translated by JEPHCOTT Edmund, SHORTER Kingsley. NLB, 1979.
[24] PILE S. Sleepwalking in the Modern City: Walter Benjamin and Sigmund Freud in the World of Dreams[M]//BRIDGE Gary, WATSON Sophie. A Companion to the Cit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0: 75-86.
[25] KOOLHAAS R. Life in the Metropolis or the Culture of Congestion[M]//HAYS Michael.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320-331.
[26] BATAILLE G. The Labyrinth[M]//STOEKL Allan.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171-177.
[27] TSCHUMI B. The Architectural Paradox[M]//HAYS Michael.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218-228.
[28] LEFEBVRE H. Towards an Architecture of Enjoyment[M].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29] TSCHUMI B. Event-Cities (Praxis)[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30] KOOLHAAS R. Junkspace[J]. Obsolescence, 2002, Vol.100: 175-190.
[31] KOOLHAAS R, Bruce Mau. The Generic City[M]//Rem Koolhaas, Bruce Mau. S, M, L, XL.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1995: 1239-1264.
[32] NEGRI A. On Rem Koolhaas[J]. Radical Philosophy, 2009, Vol.154: 48-50.
[33] MAZZOCCHI P. The Flesh of History: Intersubjectivity, Experience and Utopia in Merleau-Ponty and Benjamin[D]. Toronto: Political Science York University, 2016.
[34] WEIGEL S. Body- and Image- Space: Re-reading Walter Benjami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35] BENJAMIN W.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M]//EILAND Howard, JENNINGS Michael W.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4, 1938-194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13-355.
[36] 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 Abingdon: Routledge, 1962(1945).
[37] LEFEBVRE H. Writings on Cities[M].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38] BORDEN I, Joe Kerr, Jane Rendell, and Alicia Pivaro. Things, Flows, Filters, Tactics[M]//Iain Borden, Joe Kerr, Jane Rendell, and Alicia Pivaro. The Unknown City: Contesting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Spa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11.
[39] BUCHANAN I. Michel de Certeau: Cultural Theorist[M]. Sage Publications, 2000.
[40] BOURDIEU P. Structure, Habitus, Practices[M]//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2-65.
[41]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ynopsis

Wandering, as both a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and a technology of the Self,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20th-century critical theory and gradually becomes crucial for studying pedestrian experiences in today's high-density built environments. The distinctiveness of wandering behavior lies in the fact that wanderers neither have a specific destination nor seek a stable settlement. Wanderers constantly alter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 both phys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introducing a high degree of uncertainty into spatial cognition for architects and urban researchers. Therefore, unfolding the complex nature of wandering behavior is essential for expanding the boundary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today.

Wandering behavior was brought into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s of the 20th century, mainly because of its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ty and the modern metropolis. According to Walter Benjamin, wandering could be seen as an ideal practice for an individual to detach from and resist the industrial rationalization and the consumer culture of modern society. And it also became a theme perpetuated in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s around the 1960s.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pedestrian behavior, wandering is associated with a psychological state described by scholars as "optical unconsciousness." From a spatial perception perspective, this mental state is caused by the cinematographic visual effect encountered by the moving individual. It was discussed by scholars like Walter Benjamin and Michel de Certeau. It also form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nthony Vidler and others in deciphering modern urban spatial culture. Meanwhile, the optical unconsciousness of wanderers is also correlated to the accelerated experience of moving through space, which diverts the perceptual attention from recognizable shapes and messages to fleeting textures. This correlation is evident in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accelerating nature of modern society and technology by scholars such as Richard Sennett and Paul Virilio, and architects like Rem Koolhaas.

The optical unconsciousness formed by the unique visual perception of wanderers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interactive patterns between the body and space during the movement, where the body is not guided by the morphological and semiotic aspects of spatial geometry, but latent features. The concept of "drifting" proposed by Guy Debord in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movement illustrates this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The body is drawn by psychogeographic territories, transcending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scale, layout, and spatial structures in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embodied experienc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wandering behavior and its optical unconsciousness state can be also analyzed through the critical theoretical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concept of *blasé*. In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Critical Theory, represented by Georg Simmel and Benjamin, *blasé* is a protective mechanism against the overwhelming information within the metropolis, creating a "beneficial" estrangement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Understanding the state of *blasé* allows recognition of how the exterior environment has impacts on the formation of wandering behavior.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root of the *blasé* replies 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labyrinth nature. In the 1970s, Koolhaas and Bernard Tschumi provided insightful analyses of the labyrinth state of the modern metropolis. Concepts such as Georges Bataille's pyramid and labyrinth were employed to illustrate the special experience that lacks any external spatial references. Tschumi's design for Parc de la Villette can be interpreted as dissolving spatial referencing frames to deterritori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yramid—the overall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labyrinth—the embodied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s.

Meanwhile, the labyrinth nature of urban space is not merely a morphological analogy but is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considerations of function in late 20th-century theoretical discourse. Concepts like Henri Lefebvre's "trans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baths of Diocletian and Tschumi's proposition for "crossprogramming," resist external functional reference of space, bringing spatial experience back to instinctive, spontaneous bodily interaction. Koolhaas's works on the "Generic City" and "Junkspace" describe a homogenized, uncertain space also eliminating external references. The spatial uncertainty is celebrated by Antonio Negri as a way of off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escaping from the societal control constructed by physical boundaries. By introducing the uncertain experience caused by the labyrinth nature of junkspace to get rid of the predefined scenario of function, the space-apparatus would not be determined by its physical condition anymore, but become a dynamic existence, an open and associative medium that could be constantly reconstructed by

the moving bodies of its inhabitants.

The way that wandering reconstructs space in the experiential dimension is essentially based on the unconscious self-arrangement of the moving behavior of the individual. It involves the introduction of time dimensions in walking practices and is related to phenomenological discussions on temporality from Edmund Husserl to Maurice Merleau-Ponty. While all experienced space appears to have an evident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each wanderer's movement will reconstruct it into a sequence of spatial views along a timeline, which will be further depending on the decision on walking paths. De Certeau analogizes the turns and detours of wandering through differentiated spaces to the rhetoric of language. When the walking body constantly adapts to the space and constantly adjusts the tactics of occupying the space, the "rhetoric of walking" will in turn change the spatial form in the perceptual dimension. In addition, de Certeau also discussed how collectives reshape space in the practice of wand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s the wanderers als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rhetorical expressions of walking, ultimately their intertwined trajectories will produce another shape within the shape of the space itself.

In summary,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edestrian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metropolises (high-density cities), it is essential to unfold the complex core of wandering behavior itself. With this particular type of bodily practice, th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space, such as spati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planning in conventional design cognition, has no longer had major impacts on the formation of behavioral patterns. Therefore, we need to explore new factors for articulating the spatial intervention. Mean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individual and the environment is no longer a static, reducible map, but often produces behavioral phenomena that transcend rationality. Therefore, how to analyze these phenomena has also become important to the relevant research.

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作者简介: 闫超, 男,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 2023-10-18